

[美] 约翰·迪尼 著
刘介民 编译

中西比较文学理论

学苑出版社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1985.2/31

中西比较文学理论

〔美〕John J. Deeney (李达三) 著

刘介民 编译

学苑出版社

中西比较文学理论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美〕约翰·迪尼 著

刘介民 编译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西四颁赏胡同四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380,000

开本：850×1168

印张：15

印数：2,3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秦守雍

版式设计：雁 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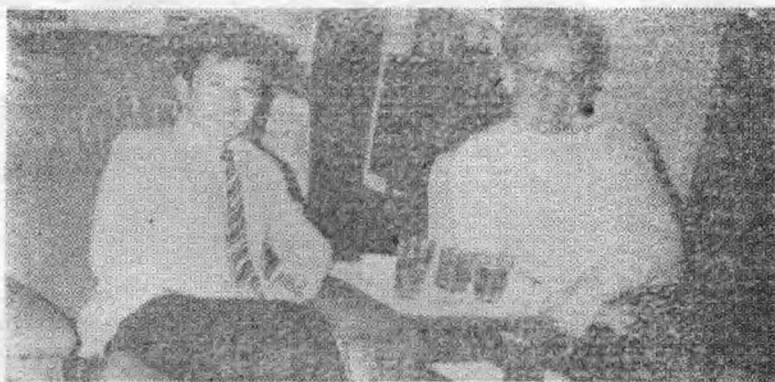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杨 勇

责任校对：陈文本

ISBN7-5077-0011-9/C·1

定价：8.00元

李达三与刘介民



李达三博士在辽宁 (1985. 5)

序

本书详述了70年代以来最富创见性的学者——李达三(John J. Deeney)博士发展起来的中西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是根据他在1978年初版的力作，作了大量补充和修订的最新版本。多年来，李先生一直是台港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领袖人物。他为开创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建设中国比较文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李达三是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1931年11月6日出生于美国费城。大学期间，他在希腊，拉丁文学和英美文学方面受过正规训练，1956年获冈扎嘎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同年，在台湾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两年后回美国，1961年获复旦姆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之后，他先后执教于美国圣弗兰西斯科大学、菲律宾路易斯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他主要讲授英美文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和翻译等课程。特别是在台湾期间任英文及比较文学教授、专授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博士班的课程。他在1956年第一次来华，1965年以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文环境中度过的，因此，培养了他对中文和中国文学的兴趣。此外，他精通英文、法文、中文、拉丁文并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为他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达三先生广泛参加各项学术活动，他是台湾大学比较文学学会主要创建人之一，并当选为该会常务理事。1973年曾与颜元叔教授代表台湾比较文学学会出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三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1977年起应聘香港中文大学后，参加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工作，自1985年起兼任该中心主任。他是比较文学硕士课程教学委员，与袁鹤翔教授等

学者合作完成了一套比较文学硕士教学计划。他曾参与筹设成立香港比较文学学会，任两届副会长。他教授的比较文学硕士班接受国内学生，他主持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经常有来自国内的学者进行一般为期3个月的短期研究工作。这个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每年组织一次学术年会，内容包括语言学、比较文学；每年大约有十几位国内学者参加。李先生主持的这个中心还经常为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团体赠送资料。他亲自承担搜集中英文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组织编译书刊，选拟当前研究课题，如《文学批评术语汇编》、《与比较文学研究有关之专题论述》、《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人名辑录》、《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等等。

李先生在台湾期间就经常向非中国人团体讲授有关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在香港用中英文作过多次有关文学与翻译问题的专题讲座。他也先后来国内如北京、上海、黑龙江、辽宁、广西、广东、陕西等地的大学和研究单位讲学。

李先生著作甚丰，如《中西比较文学：理论与策略》《英文汉语研究体例与拼音手册》、《英美比较文学书目》、《译事参考》等等。20年来，他先后出版专著九种，16种单行本，发表论文26篇、书评2篇。197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是一部重要的中文理论和方法论著作，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大部分论著都是由英文写成的或修改自中文之讲义。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时，有机会收集到李先生的全部英文原著，回国后与友好鼎力合作，翻译并编成此书，以飨读者。

本书资料来源丰富、语言清新朴直、生动而富有哲理性；作者，知识渊博、立论合乎情理，面向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第一章，比较文学理论。讨论了中西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研究途径、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新的挑战及比较文学的思维习惯。第二章，比较文学史论。通过西方部分：法、德、意、

英、美；东方部分：日、中、印、朝、越等国比较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重点讨论了文学体裁、文学风格、文学结构、文学的历史分期等，并论及到比较文学的展望。第三章，比较文学方法论。从研究的目的和态度、历史背景出发，论及“正”“反”

“合”，有机的统一、复合研究法、科际整合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法、心理学研究法等，涉及到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宗教思想、文艺思潮、艺术思潮、感情思潮等。第四章，中西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的方法。从中国和东方、中国和西方宏观的比较研究到具体探讨中国19世纪的巴洛克诗人李商隐，《忏悔录》与《浮生六记》的比较研究，实践了他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也论述了亚洲文学与社会发展的比较，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寓意。第五章，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探讨了结构错综的中国学派及其特点，提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五大目标，并论及比较文学在中国的重要发展及成就。第六章，是有关比较文学教学方面的问题，向大学行政负责人介绍比较文学，中西比较文学书目英语资料教学分类等。

应该说，中西比较文学几乎毫无例外地被欧美比较文学家所忽视，一些被称为国际上比较著名的比较文学家对中国文学了解甚少，甚至一无所知。除法国的艾金伯勒(Rene Etienne)及少数学者注意了中国文学及中西文学比较外，比较文学基本上还停留在19世纪以来产生的欧美文学研究之中。李达三以他的远见卓识，在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不久，便萌生了开展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想法。早在1964年，他就写了一篇评论普雷斯(John Press)在国外教英国文学的文章，题目是“东西方文学与文化之关系”(East—West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Relations)。文章提出了沟通中西文化使者肩负的双重任务。他引用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孟拉博士所说的一句话：“你想轻松地肩负一座桥梁的任务而不被踏践而过，那是不可能的。”以后的十几年，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奠定中西

比较文学研究基础的理论和方法论文章。李达三以一个中国人的观点提出一些重要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建议。他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受到海内外学者的敬重并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中文专著《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New Orientations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本书就是在该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指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正如他在序言中指出：“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无论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都处在转折点的十字路口上，或者是东方袭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或者是我们鼓足勇气向前迈进，以中国特有的观点，找出新的方向。”^①李达三强调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上，用比较的方法重新观察评价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以中国文学现代化与中西文学的输出入来涵盖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进而加强理解中国文学，丰富世界文学宝库。他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五个目标，雄心勃勃，富于战斗性，兹节录如次：

1. 在自己本国的文学中，无论是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找出特具“民族性”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以充实世界文学。
2. 推展非西方国家“地区性”的文学运动（如中——日——韩），同时认为西方文学仅是众多表达方式之一而已。
3. 做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发言人，同时，和其他许多发言人一样，并不自诩代表所有的非西方国家。
4. 一旦非西方诸文学的学者，藉比较方法研究文学，而能够知己知彼时，我们就会逐渐构想一些新的文学观点，通过发表，公诸于世，以与西方传统的文学观念相抗衡。
5. 消除许多人的无知及傲慢心理，使我们对比较文学的观念能够真正国际化。^②

^① 《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再版第4页。

^② 《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再版第216—270页。

由以上观点看出，李达三是从中国文学的观点出发，把中西比较文学置于20世纪的 国际学术领域内，提倡理论与实践的民族性。它冲破了西方在评价世界文学史所做的全面垄断，推动东方文学运动，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观念上代表整个世界；努力挖掘非西方诸国文学的宝贵遗产，促使非西方化的真正世界文学的诞生。

由此可见，李达三明确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是对西方学术假设的挑战。他通过对西方比较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及批评观念的彻底调查，纠正了西方比较文学家的缺失，冲击了法、美学派，打破了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论。任何一个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再也不能固步自封，只局限在欧美文学之中。即使有人拒绝李达三对中西比较文学所涉及概念的具体解释，他也不得不了解这些解释所根据的基本设想是什么。无论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也许都未曾足够地考虑到文学背后的文化模式，这是因为他们同是在欧洲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当比较文学接触到东方时，文化背景的差异，带来了一系列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因此，国际比较文学家们都应接受李达三的观点，而台港及国内一些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正朝着更系统的方向发展。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向东方的转移，不仅是那些赞同李达三的人促成的，而且也是那些竭力证明李达三是错误的，而又不得不站在他的立场上正视他的观点的人们促成的。

然而，中西比较文学的另一个效果是唤起人们对这样一种观念的兴趣：即从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等如何反映一个共同的潜在的意识出发来探讨它们最为恰当的方法。这在刘若愚、叶维廉等对文学理论及东西比较文学模子的应用的一些研究中，都跟李达三的理论互相补充。肯定中西文学确有许多共同点、完全有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中西比较关系的研究是一个范围广泛而且发展得很快领域，李达三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很多这

方面的研究成果。

翻译的研究在比较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李达三对“个人媒介者”及文学的国际支流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探讨与比较文学有关的翻译问题时，他首先指出翻译是“创造性的阅读”原文，是在创造性阅读原文后，在获得了充分的注释情况下，加以接受的。他同时认为：翻译是一种“传递”(Transmission)，是“从一个生命转移到另一个生命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生命也就是将一部原文的生命移译到另一种新的生命中去。他进一步论说：翻译者同时是传递丰富的文化传统，这就与人文和社会科学联系起来。他比喻说：“我们是文化之间的小路或者桥梁，如果不被人家重重踏践地而过，便不成其为桥梁了。”^①

李达三同时认为，翻译本身是一种创作行为，翻译者把不同语言而且常是不同时代的作品带进本国当代文学传统中。尽管译者往往恪守原作的内容，尽力用另一种语言复制，但也避免不了对原著的改编和误译。他举出意大利一句著名的谚语：翻译家(traduttore)都是叛逆(traditore)，即被认为是“创造性叛逆”(trahison creatrice)，既不是“断然拒绝”也不是“照抄照搬”，允许相当的删减、添加、意译以及形式上风格上的改变。翻译不只属于某一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属于那国文学本身的研究范围。翻译本身是外国作品与本国作品间最好的“媒介”，而外国作品正是以其改变了的、翻译过的内容及形式才对本国文学产生影响的。

李达三就比较文学中翻译问题的论述，涉及到翻译创造新的文体、直译与转译、窜改与改编、译本的比较、译著中的序言和注释等等。他在“修改比翻译重要”一文中，又特别强调

^① 见本书《通晓两种文化与翻译》

了翻译重视“琢磨”(Polishing或推敲)，“玉不琢，不成器”，强调要以最恰当的译出文字来表达原文。

前述内容是李达三博士在这本书中所论及的理论体系的精髓。研究中西比较文学，不可忽视这本书。总之，这部书的出版，作者和出版界对中西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应向他们表示致谢。特别要感谢出版社的秦守雍同志为书稿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对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热情支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和岭南基金会给与的关心和支持。

本书是集体翻译成果，第一章“中西文学关系”一节，由曲艳娜译、刘介民校；“通晓两种文化与翻译”由王士跃译、范革新校。第四章“从比较角度看中国文学”张英译，“中东比较文学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由张锦译、孙丽校；“《忏悔录》与《浮生六记》中巧言式和抒情式表达之比较”由邓沃权译、范革新校；“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李商隐”由徐亚杰译、史国强校。第一章中“文学与社会的比较观”、“东方或还是西方”和第五章“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二、三部分，由李洁译、刘介民校。第六章中“论文及论文选题之进言”，由李云启译、刘介民校；“中西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由何行恕译、刘介民校。本书李达三先生写的前言，由孟艳娟、刘振江、任承科译。在编稿的最后阶段，又得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组梁丽娟、李家碧、余君伟的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刘介民

1987年5月于沈阳

前 言

近年来，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行热情建议把我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在中国再版。最近，当刘介民先生组织同人，把我的文章翻译，整理编成文集时，我得承认，面对这样的荣誉，颇有受宠若惊之感。诚然，当一个人为了出版目的，面临重新系统而明确地阐述自己观点的重任时，除非他认为有什么东西值得一说，否则就不该找这个麻烦。尽管我愿意这样认为：在过去的20年间，我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点的影响。首先我要承认，我所享有的声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与在比较文学上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同行的通力合作。

既然这本文集是以我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所有章节都全部或部分修改过）为基础，我认为从1978年第一版和1982年第二版序言中引述几段是无可非议的：

虽然笔者接受的教育是英美文学方面，但对比较文学发生专业性的兴趣，实始于1956年初学中文之时。8年后，我才将研究心得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做成系统的整理。就在那时，我写了一篇题名为“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的论文，内容就包含了这本书的初步概念。文中提及一个沟通文化的使者所肩负的双重任务时，我曾引用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的孟拉博士所说的一句话：“你想轻松地肩负一座桥梁的任务而不被践踏而过，那是不可能的。”

这些文章是我个人12年来的教学心得与研究——出版的一些成果。我但求保持坦诚客观的态度；但由于深受本国文化的影响，可能难免还有“美国佬”的成见。所以，

我恳求读者不要误解我的好意，以为我这个人竟敢随便地对中国文学妄加置评……

为了使比较文学研究能兼具现代学术观点以及中国文学传统精神，我用一条共同的主题线索将这几篇文章贯穿一气。换句话说，西方的比较文学专家经常忽视了中国文学中的潜在价值。所以这本书有意不断地把中西比较文学置于20世纪的国际学术领域内，以纠正西方比较文学家的缺失。

身为一个外国人，我原本没有资格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基于这点自知之明，我只能就能力所及来从事若干研究或提出一些问题，和大家共同讨论。读者不难发现书中所举有关中国文学的例子，都是最浅显易见的。我认为挑选最适切的例子，来作比较或对比，应由中国文学专家们来做较为恰当。本书以最方便的形式汇集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是以书中充满了许多引语与参考资料），其目的是希望在中国学术界激起回响。限于笔者所学，本书所论常偏于英美文学传统。其实，这些研究都可以适用于中国文学的论题。要是能够从中国的文学经验中找出特别的题目，予以有系统的研究，将来一定会出现一套配合中国文学精神的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

从事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首须了解自己所探讨的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已有了多少成果。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学者们应一味模仿西方的成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知识的领域浩瀚无边而人生短暂倏忽，实在不容我们由于不谙国际学术现况，重蹈前人的错误，或重复别人研究过的问题。为了向西方的学术假设挑战，我们必得了解这些假设以及其发展过程，就是要对促成西方比较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及批评观念作一番彻底的调查。这些文章绝非定论，而是希望指出若干新旧不同的研究方向，期使学者

在迈向比较文学研究的路途中，不致落入陷阱。^①

我相信尽管上述评论由初版到现在已经过了10年，但依然正确。在稍为简短些的第二版序言中，我详尽阐述了对于“中国学派”概念的更大关注：

初版问世后的短短3年之间，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也有人提倡用“中国成分The Chinese Dimension”的讲法）有许多不寻常的发展趋势。这种新现象，本来可以在比较文学史一章的中国部分里加以补充介绍，可是我希望能在意识形态的范畴里对整个问题加以讨论，而不仅仅当作历史现象来处理。^②

在现在这本文集中，“中国学派”部分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我便把它从原来《比较文学史》有关章节和扩展了的第二版后记中提取出来。因为整整10年令人振奋的发展，“中国学派”应该有她自己独立的一章，文集中最长的一章，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章。我只能匆忙补充一点，我的许多 *de jure*（应该）发表的观点，经常得不到 *de facto*（事实）依据的支持。然而，尽管“中国学派”确实得到了重要发展，如在中国—东方（和中国—西方相对）比较研究中得到了必然结果，我们也不应该夸大其在比较文学研究整个范畴中的重要性。实际上，从整个国际范围看，“中国学派”尚处在萌芽时期，文化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和中国现代化运动紧密相连。

即便如此，“中国学派”仍是70年代中期我在台湾大学讲授比较文学博士课程时使用的新词语。从那时起到现在，尽管我希望这些思想的某些方面发展得更为明朗，我的基本思想并没有改变。因此我很高兴在准备这本文集中有机会回顾一下自己学术生涯的某些方面。现在，我来概括一下实际影响我一切比较文学论著的一些主导思想。

① 第一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第1—111页。

② 第二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1页。

我的大部分讲稿和出版物都是按“中国学派”思想构思的，其愿望在于在通常以西方比较文学为主导的领域内，协助建立和发展“中国学派”的重要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发现我的看法很自然地可区分为三个连贯的——我认为至少可以说——三个紧密结合的单元。这三个单元强调从中国文学的观点和从整个文学的观点来看研究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我将在下一段中逐个论述这三种看法。

我还是保守地认为，人的本性，姑且不谈其他许多方面，是由意志和理智构成的。我这三个部分是和大脑的两个功能相一致的。1) 人的意志（和对意志有极大影响的情感）要求有一个渴望实现的目的去推动其作用的发挥；而意志就成为那些基本态度和动力的依托，促使我们利用各种方法向着欲想达到的目标努力（如推广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2) 我们富于理性头脑的运转表明，智力按其功能可分为理论智力和实践智力。理论智力是对那些基本原理和有关的方法论的思考。这些原理和方法论帮助我们判定什么样的理论构成更为实际的事物的基础。3) 实践智力，论述那些实际教学方法事宜。

我的思维方法很显然是西方式的，因为我在强调理性的同时也强调简练的定义和合乎逻辑的分类。这种按照某种有规则的思维过程把实际事物分类的嗜好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方式，这种方式既合于科学亦适于哲学。其中按照大前提和小前提逐步进行，进而达到一种“必然”结论的方法令人颇为满意。但这并不是说理智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更不用说智慧了！由于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词汇，西方人便用“直觉”一词来描述常常和东方人洞察力相联系的另外一种知识，即用一种非推论性的（即“非理性的”）看起来不费力气的“自然”方式对实际事物奥秘的立即感知。一旦掌握了含义，文字就失去了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在道家庄子的“鱼筌”故事中总结得很恰当（“得鱼忘筌”）。这一点在许多受禅宗教影响的朦胧抒情诗

中也有所表露。禅宗认为可以形成概念的内容就不值得研究。

直觉也许会很有价值,特别对艺术构思而言。但对类似我们这里进行的批评性研讨却帮助甚微。一个人并不真正去讨论或解释另一个人的直觉;他只是或者接受或者拒绝。一些人坚持认为,直觉主义者的断言是对苦苦思索的一种逃避;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强调艺术成就而不是批评性的演说。这正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学士那种头脑冷静,态度超然,逍遥自在的举止风度。这些人只是努力接受奥秘,一头扎入其中,并不想坚持不懈地依据某种理性原理去解释这一奥秘。事实是,许多西方唯理论者徒劳地努力,狂热地追求,试图把无穷无尽的事物统统囊括进他们错误地视为最真实的一个整洁的理论包裹里去。许多中国人对此惊讶不已。

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较之从前更为严肃地看待东方文化。那些胸怀壮志的比较学家称之为巨大的未知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方比较文学正方兴未艾,遍及全球。我们可以在对在这一领域中中国做出潜在贡献持友好态度的一些西方作家最新论著中窥见一斑。其中著名的有:克劳迪奥·格兰的西班牙语的Entre lo uno y diverso: Introduccion a la literatura comparada,^①雷内·埃提艾姆保的“Sur le renouveau du comparatisme en Chine

① (巴塞罗那: Editorial Critica 1985), 归岸讨论了比较文学界背后的整合哲学和与当代的比较文学发展(尤其是理论方面)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引用的例子包括中文和日文著作。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的大标题。Entre lo uno y lo diverso.可直译为“在单一与多样之间”,它概括了我自己对一元与多元,以及单一与众多这哲学上恒存的难题的想法。归岸之前的哈佛大学声名显赫的比较文学计划主席哈里·莱文,也热情地赞许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见他为《中国文本:比较文学研究》(The Chinese Tex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周英雄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所写的序言。又见乌尔里希·韦斯坦的“D’ou venons-nous? Que Sommes-nous? Qu allons-vous?”“比较文学的持久危机”,《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第11卷第2期(1984年6月号),第167—192页。

populaire”^①。此外还有即将出版的印第安那大学克罗斯·克吕弗，克利弗德·弗拉尼根编辑的英文版论文集。

上述最后一本文集可以说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原因是编者提出了文学研究中一个新的范例。现在，我想只讲一下他们对非西方文学传统的关注，特别是因为这可能跟前两段有关。中西方比较文学家一个非常恰当的观念就是他们强调非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尤其可以引起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对任何方法和理论结构都不屑一顾。尽管许多年轻的中国比较文学家推崇西方文学理论，传统的中国文学家对于包罗万象的西方文学理论系统还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他们觉得一下子卷入理性分类学说和蒙昧的术语中去，会使人们对于构成生活和文学那些本来就难下定义，而不能概念化的反论和奥秘，更为迷惑不解。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回到（我不得不承认根据自己非直觉论所作的）下列几个方面的区别上来，就是意志、理论智力和实践智力的区别。当然人脑中这些功能有很多重叠处。但我认为收集在这里的所有文章都对位于“智力生活”中心的“整个人”的观念的某一方面做了答复。通常，我们对自己的学术生活并不满意，除非这三个方面取得平衡。

态度与动机

我们在把思想转向比较文学广阔复杂的外部领域之前，要先研究一下其内部涉及的范围，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应该努力发展的基本态度和动机，以成为更好的比较文学家。我认为整个这一部分（乃至全书）中实际构成基本态度和动机的是开明

^① “比较文学研究”第24卷第1期（1987年3月号），1—16页。当然这仅是出自艾登堡手笔的最新文章之一，它表明他是西方比较文学家中那些坚持认为非西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对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的最早倡导者之一。该文译本将在中国出版。